

高等教育与全球化丛书

THE GLOB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全球化与大学的回应

Globalizing Practices and University Responses

——【美】简·柯里 【美】理查德·德安吉里斯 【荷兰】哈里·德·波尔——

【荷兰】杰罗恩·胡斯曼 【法】克劳德·拉科特◇著

王 雷◇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全球化与大学的回应

[美]简·柯里 [美]理查德·德安吉里斯 [荷兰]哈里·德·波尔
[荷兰]杰罗恩·胡斯曼 [法]克劳德·拉科特 著
王 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6-07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大学的回应/(美)简·柯里等著;王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高等教育与全球化丛书)

ISBN 978-7-301-16439-6

I. 全… II. ①柯里…②王… III. 高等教育—研究—世界 IV. G6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7369 号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Globalizine Practices & University Responses, by Jan Currie & Richard DeAngeli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raeger, an imprint of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Westport, CT, USA. Copyright © 2003 by the author(s).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全球化与大学的回应

著作责任者: [美]简·柯里 [美]理查德·德安吉里斯 [荷兰]哈里·德·波尔
[荷兰]杰罗恩·胡斯曼 [法]克劳德·拉科特 著 王 雷 译

责任编辑: 泮颖雯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439-6/G · 277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6.75 印张 245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总 序

当今世界,全球化似乎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现象。全球化可以理解为一种流动的现代性——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资金、知识、技术、价值观、思想以及信息跨国界和跨时间的流动,这种流动反映了各国之间与日俱增的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特征。通过“时空压缩”、“远距离操纵”、“即时互动”等途径,全球化不断地整合与分化着全球的各种力量和利益关系。它给我们带来各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相互联系的同时,也凸显了霸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全球化的主宰力量不仅仅局限于各国政府,还有跨国集团、中介组织、文化与媒体机构、公民组织以及宗教团体等。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力量的交汇、碰撞与融合。

由于各国历史、传统、文化、社会发展重点的差异,全球化在世界范围的实际影响是不平衡的。通过市场整合以及由发达国家及其机构操纵的国际组织及其制度安排,全球化很可能(实际上已经)加剧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化,导致社会冲突和矛盾加剧,并形成反全球化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发展表明,各国之间的跨国互动与影响变得极为复杂,难以预测和掌控。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真正“扁平”!

大学作为现代社会培养人才、创造与传播知识的轴心机构,必然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斯科特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全球化给大学带来深刻影响的必然性:第一,大学负有传播民族文化的责任;第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性的研究文化网络的形成,促进了大学教学的标准化;第三,全球化市场动摇了作为大学主要收入来源



的福利国家公共财政的基础。^① 加拿大学者奈特进一步概括了全球化趋势的不同要素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影响：一、知识社会的兴起，导致社会更加注重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持续的职业发展给高等教育创造了新的发展机会；新技能和知识导致新型的大学课程和资质认证，大学研究和知识生产的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二、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本国和跨国的新型教学方法。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本国和国际范围内教育和培训的商业化和商品化趋势。四、贸易自由化消除了经济上的壁垒，也增进了教育服务和产品的进出口。五、新的国际和地区治理结构和制度的建立，改变了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角色。^② 如果我们认同上述判断和分析，那么这些趋势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意味着什么？

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系列历史力量，更是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全球化把大学变成变化不定的全球物质、社会经济与文化网络的一个移动点。值得思考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许多政策、管理、心态和理念依然故步自封，其发展依然落后于整个日益开放的社会节奏，此时，我们的这个“移动点”将被带向何方？大学是否还需要思考大学独立性的问题（虽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学独立性都是奢侈的话题）？

中国日益成为国际上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举足轻重的国家，对全球化体系的参与程度与影响也日渐深入。但关于全球化力量的根源、作用方式、影响程度以及世界不同地区的回应，我们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与认识。虽然拥有日益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在全球化高等教育市场上，我们还远远不是高等教育强国。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多次巨大的“断层”，学术的传统和精神在流经这些断裂过程时不断地丧失。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缺少了学术“原始资本积累”的中国大学，可能需要更多地利用全球化的契机，补上学术传统这一

^① Peter, S. (2006)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4(3): 5—6.

^② Knight, J. (2006) Cross-border Educati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Programs and Provider Mobility. In J. C. Smart (ed.),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Volume XXI)* (pp. 348—349). Dordrecht: Spring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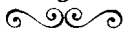
课——我们不能给这个传统设置国界！另外，中国大学应该具有全球化的眼光，但还需要本土化的行动，否则，我们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地位将很尴尬。

我们希望，本套译丛的翻译和出版，可以为中国读者认识全球化对世界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其应对方式打开一扇窗。透过此丛书诸多世界知名学者的文字，我们可以分享他们对相关理论和概念的辨析、对各国和地区政策的反思、对国家和大学个案的评价……同时，我们相信，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不能局限于概念的辩论，或者满足于对个别发达国家的全球化境况的了解。既然全球化影响是各国差异性的一个“函数”，那么我们需要洞察世界上更多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领域的现实和发生的变化——本丛书特别呈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近年的发展概况。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世界高等教育的丰富性，并且发现差异性背后可以共享的思想、处境和使命。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侯定凯 李 梅

2008 年 12 月



致 谢

我们所在的大学都在发生着变化。对某些人来说,大学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尽管环境发生了改变,但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采访了法国、挪威、荷兰和美国四个国家的大学教师和行政人员,收集了受访者观察到的信息,并分析那些可能给大学带来变化的因素。我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探寻了全球化的实践活动给法国、挪威、荷兰和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带来的影响,我们也分析了这些变化是否真正改变了(以及如何改变)大学的内部结构;我们还深入了解并分析了各种改革措施对于教师职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资助了本研究。另外,我们的访问工作也获得了以下单位和个人的支持:特文特大学(Twente University)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CHEPS)、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及其主任阿尔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教授和研究生大卫·恩格伯格(David Engberg)、奥斯陆大学(Oslo University)教育研究所以及我们的同仁阿瑞德·特捷达夫(Arild Tjeldvoll)教授(他帮助我们进行访谈和搜集信息)、阿维侬大学(Avignon Univeristy)科学与应用语言学系、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教育学院(他们协助了我们的文案工作)。许多同仁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我们要对大卫·迪尔(David Dill)、盖伊·尼夫(Guy Neave)、伯恩·斯坦萨克(Bjorn Stensaker)、阿瑞德·特捷达夫、英格维德·马海姆·拉森(Ingvild Marheim Larsen)和克里斯汀·穆塞琳(Christine Musselin)的建设性意见表示感谢。



我们也要感谢出色地帮助我们使用 NUD. IST 软件完成数据分析的专家哈丽特·皮尔斯(Harriett Pears),负责编辑的保罗·斯奈德(Paul Snider),负责记录的斯蒂夫·罗布森(Steve Robson),负责采访的琳·米克(Lynn Meek),法语翻译纳塔丽·韦斯科特(Natalie Westcott),负责其他繁琐杂务的卡瑞恩·巴伦伯格(Karyn Barenberg)。我们要特别感谢罗兰·阿伯内蒂(Loraine Abernethie)富有创意的工作,以及克莱尔·皮克林(Claire Pickering)的编辑、索引制作以及为最终定稿而做出的努力。

最后,我们要感谢来自波士顿学院、阿维侬大学、奥斯陆大学和特文特大学的 131 位教师和行政人员,他们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欣赏他们在访问中表现出的远见卓识,以及在案例研究完成后提供的宝贵建议。我们希望,通过大学全球化实践调查而获得的发现,有助于深化对本书提出的有关问题的讨论。

简·柯里(Jan Currie)

理查德·德安吉里斯(Richard DeAngelis)

哈里·德·波尔(Harry de Boer)

杰罗恩·胡斯曼(Jeroen Huisman)

克劳德·拉科特(Claude Lacotte)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研究的背景与研究设计	(26)
第三章	私有化、竞争与企业化管理	(56)
第四章	大学管理	(93)
第五章	责任机制	(134)
第六章	聘用机制的灵活性	(164)
第七章	新技术	(189)
第八章	全球舞台上大学的未来	(218)
附录一	样本介绍	(236)
附录二	采访协议	(240)
Bibliography		(242)

第一章 导 言

全球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坚定的拥护者也有坚决的反对者。例如,最近发生的反全球化抗议运动¹,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企业全球化或者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全球化。这些抗议者声称,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自由贸易运动。与之相反,那些拥护全球化的人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此外,还有一些人对全球化持有比较中立的态度,认为它促使世界各国人民能够进行更方便、更迅捷的交流。他们也把互联网看作是一个全球化的工具,是一种潜在可以促进信息民主化、世界文化交流以及全球经济整合的机制。然而同时,全球化也往往把各国社会和世界分化割裂为三个群体:进行全球化的人、被卷入全球化的人和被全球化排除在外的人(Yang & Vidovich, 2001)。在全球化进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中性的术语,要从意识形态和物质两个层面来分析研究,所以我们特别通过考察其对大学的影响来深入讨论全球化。本书关注的焦点是在研究大学过程中所观察到的全球化实践。

本书所考察的全球化实践是 30 年前开始出现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最初,这些实践在美国涌现,之后传播到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及英国等国家,之后进一步传播到欧洲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这股潮流在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中变得更加猛烈。我们不能确定这些全球化实践是否是由全球化本身,或者是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导致的,但它们确实是在同一时期兴起的。例如,虽然很多政府发起了公立机构改革,使大学在更宽松、更商业化的环境中拥有更多体制上的自主权,但诸如“远程遥控机制”等新的管



理方式使得大学实际上还是由政府管理,只不过方式更隐蔽。令人惊异的是尽管显现程度、强度以及时间略有不同,但是这些改变是如此之快,范围亦是如此之广,好像几乎同时发生在每一个国家。调查显示,很多全球化实践与大学改革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然而,它们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例如,一些像大学私有化改革这样的实践,可能与高等教育民主化或大学规模扩张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详细阐释这些实践的因果关系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实际上,本书主要关注某些全球化实践对某些大学以及个人的影响,比如不断变化的教师职业性质(Porter & Vidovich, 2000)。因此,本书主要讨论在大学层面上全球化对教职人员的影响。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从精英教育逐渐转向大众教育,很多国家的政府削减了人均高等教育投入经费。随着大学拥有的自主权变得越来越大,各国政府要求大学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很多大学,由于学生与教职工比(Student-to-staff ratio)的增加,保证教学质量的问题受到了人们的日益关注。现在很多大学或利益相关者,如政府和学生,都要求教师确保教学质量,尽管教师已经饱受工作负担增加所带来的压力。学校要求大学教师逐渐掌握诸如网络教学、电脑操作、了解市场营销以及懂得出售知识产权的法律程序和开发海外市场等技巧。这些实践改变了学术工作的性质,但同时也经常造成教师情绪低落和工作满意度差。此外,学校通过聘用更多的兼职人员来提高教师队伍组成的灵活性,改变单纯由专职教师组成学术团队的传统习惯。

本书将具体关注高等教育私有化、大学管理、责任机制、聘任机制,以及新技术等问题。这些热点问题虽然没有涵盖高等教育中的所有新现象,然而它们确实开始成为很多国家政策制定者们所面对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而大学的管理者和教职人员就这些挑战、面临的机会和与全球化相关的问题会做何回应呢?教师会抵制,或适应,或改变,或顺应政府的要求和这些变化吗?在多大程度上大学会创造出全新的或者是一种混合的管理模式,既保留一些旧有的传统价值又把它们与新的管理

方式相结合? 互联网如何改变着大学的职能? 这些都是本书所讨论的问题。然而, 我们首先要了解促使我们进行全球化实践研究并写作本书的创作思路。

创 作 思 路

来自不同背景的作者们是如何聚在一起写这本书的呢? 本书的作者们有着不同的国籍(美国、荷兰和法国), 分别居住在三个国家(澳大利亚、法国和荷兰), 对四个国家(法国、荷兰、挪威和美国)的大学进行了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其中一名作者简·柯里, 对澳大利亚她所在大学发生的变化感到困惑, 在得到澳洲研究理事会的资助后, 决心研究在澳洲和美国的大学中教学研究工作的不断发生变化的原因。随后从 1994 年到 1996 年, 她完成了对公立大学的六项案例研究。在研究过程中, 她碰到了来自很多国家的关注同一问题的研究人员, 其中与来自加拿大约克大学的珍妮丝·纽森(Janice Newson)的会面是非常重要的。她们感慨道: “我们很快意识到, 我们都在以同样的热情和紧迫感谈论着全球化对大学的影响。”(Currie & Newson, 1998, p. ix) 在 1996 年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上, 她们一致同意组建一个委员会, 并在会议期间决定编写《大学与全球化: 批判的视角》(*Universities and Globaliza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一书。该书收录了大会提交和在各自国家研究相同现象的研究者的若干论文。随着该书的出版, 柯里又向澳洲研究理事会申请了进一步的资助, 来对比研究欧洲和英美大学对全球化的反应。这个资助项目中包括三名研究助理: 理查德·德安吉里斯、珍妮丝·纽森和阿瑞德·特捷达夫, 其中阿瑞德·特捷达夫已在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上提交了论文。这个资助项目的参与者还包括克劳德·拉科特和林恩·米克(Lynn Meek)。拉科特曾参与了阿维依大学的案例研究, 林恩在此之前比较过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高等教育。



这一研究项目的总体目标是进一步探讨这个已经获得广泛认同的观点：全球高等教育正日趋相似，日渐趋同；同时微观层面上的差异使得在高等教育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践过程中，全球化遭到抵制并且高等教育也有更加本土化的趋势。[具体的目标是研究在管理(倾向于企业化的管理模式)、责任机制(倾向于应用绩效指标和教学质量评估)、资金来源(倾向于私有化、市场化以应对逐渐加剧的竞争)和新技术的使用(倾向于更多地使用互联网、卫星电视和网络教学)等方面，世界普遍潮流对不同大学的影响程度。]本研究选择了来自四所大学的案例来进行分析，各自代表世界潮流带来的一定影响。简·柯里在大学里完成了大部分访谈工作，并获得了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的阿尔特巴赫、阿维依大学科学与应用语言学系的克劳德·拉科特、奥斯陆大学教育研究所的特捷达夫、特文特大学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的杰罗恩·胡斯曼(Jeroen Huisman)的大力帮助。他们使柯里在选择受访者、接触最高管理层的关键知情者方面受益良多，他们还为柯里提供了一间办公室，并使她可以方便地使用电脑、图书馆及其他设施。

当我们开始申请研究资助时，很多作者强调了全球化的双重本质：第一，促进了同质化(homogenization)；第二，激起了本土文化对全球趋同化(uniformity)的抵制。坎宁安(Cunningham)、塔普萨尔(Tapsall)、里安(Ryan)、斯泰德曼(Stedman)、巴格登(Bagdon)和弗洛(Flew)指出，广泛应用技术和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让一些人认为会出现一个“全球市场”(Cunningham, Tapsall, Ryan Stedman, Bagdon & Flew, 1998)。但与之相反，本研究支持世界市场进一步分化，以及将会产生无数跨国和区域规模的(而非全球范围内)利基市场(niche market)*的观点。此外，亨利(Henry)、林嘉德(Lingard)、利兹维(Rizvi)、泰勒(Taylor)提出，“全球化进程的运作方式并不存在什么基本决定因素，因为对各种全球化的压力来说，同时也存在抑制和反制的因素”(Henry, Lingard, Rizvi & Taylor,

* 利基市场(niche market)：指那些被市场中有绝对优势的企业忽略的某些细分市场。——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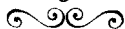
1997)。在全球化中出现的矛盾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包括普遍化和特殊化的矛盾,以及同质化和趋异化的矛盾。(Porter & Vidovich, 2000)

全 球 化

斯科特认为,全球化是当代大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Scott, 1998)。他认为全球化的威胁比在文艺复兴时期和科技革命期间大学所面临的挑战更严峻;也比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的挑战更紧迫;同时也比20世纪集权主义的挑战更具威胁。这个挑战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大学的?每所大学对全球化的回应都是独特的,然而也经常受到推行全球化的政治家们和官员们的影响,因此,一些大学反应迅捷且使这些全球化实践成为其内部惯例,而其他大学则谨慎行动、逐渐适应或干脆抵制这些实践。

在考察全球化对大学的影响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而且也必须意识到不是所有国家都要遵循美国模式,还可以选法国模式。法国人经常通过抵制麦当劳和反对美国电影独霸市场的方式,来表现其反对全球化、反对美国霸权和反对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的态度。特恩布尔把法国人工作时间由每周39个小时减少到35个小时看做是一个公然挑战和反对美国式效率和经济全球化的行动(两者都以需要人长时间工作而著称)(Turnbull, 1999)。一名法国律师解释说:“这必须停止!法国人一向以高品质的生活而著称。我们这么做是给别人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使显得很愚蠢,但仍然很不错;因为我们要过文明人的生活。”(Turnbull, 1999, p. 32)

与巴黎美国商会和那些认为每周工作35个小时是一种倒退的批评者相反,在法国实行每周工作35个小时后的第一年法国经济增长了3%,同时消费者信心也增加了,并创造了保持连续九年9.2%的低失业率(Anderson, 2001)。此外,一项关于法国劳动者





的调查发现,86%的人认为个人以及家庭生活得到了改善,74%的人认为个人事业得到了发展,50%的人认为工作士气提高了。

在近期的一本杂志中,法国外交部长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Uédrine)发表了他对美国独霸世界问题的看法:“这种状况是前所未有的:就像某个古代帝国曾经征服了整个世界,包括它的一切对手一样。”他还建议,法国应该朝着逐渐消除由美国霸权导致的趋同化和单边主义的方向发展,去建立一个新的“多极世界”。(Perlez, 2000, A9)

不只法国人发现了美国人大肆鼓吹经济全球化这种现象令人担忧,在一封写给即将入主白宫的乔治·W. 布什的公开信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全球化是上帝的恩赐,但是美国式的全球化将是一个错误。事实上,它毫无意义甚至很危险。”(Gorbachev, m., 200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美国解决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政策是错误的。

此外,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Malcolm Fraser)强调,有必要限制过度全球化。然而,澳大利亚明显较喜欢自由贸易理念以及布什领导的美国政府,因此希望与之进一步加强自由贸易的纽带。

全球化的形象

当下,各种报章都给全球化描绘了不同的形象。本部分研究了其中一些形象,主要是利用美国大学的案例来说明全球化如何不同于国际化。

那么当下的报章是怎样描述全球化的呢?很多作者用经济术语来探讨全球化: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推动力、经济自由化和自由贸易体(free trade regime)。一些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全球文化现象:西方化、美国化、现代化以及价值观趋同。而另一些人在政治领域内探讨全球化:民主化或者民主实践的扩大,但很少有人提及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诸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这类的全球传媒机构在推动信息和英语语言的全球化的进



程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也存在与全球化有关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这样的特殊组织。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发展署，也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然而，这些机构组织往往遵循既有的国际规则进行运作，而非只专注于推动自由贸易和进行全球化商业实践。我们有必要将那些专注于国际事务的组织与那些目标仅是创造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机构区分开来。

此外，我们也有像互联网这样的全球通信工具。互联网可能不会导致新闻的同质化，但却可以使我们接触到更大范围的信息，使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形式。[互联网可以使拥有少量资本或者根本没有资本的弱势群体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但同时也使那些控制广播或出版（报纸、电视、出版公司）的资本家们将信息集中在一些已成为“行业门神”的跨国巨头们（如 CNN、美国在线和微软等）的手中。]因此，全球化可能产生更大的多样性、更广泛的趋同性，激励更多的社会积极分子和造成社会控制更严格。此外，全球化也激起了很多矛盾：全球文化的兴起会导致本土文化的消亡，经济全球化会导致民主的丧失，福利国家的消亡并且最终有可能导致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 无法产生。然而，不是所有报章都支持这些不和谐的论调，有些也提出了一些诸如全球化会激起本土文化抵制强势文化入侵的证据，指出市场经济也促使更自由的政治文化产生，从而推动了民主社会的建立。

斯克莱尔（Sklair, 2001）提出：“现在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是相互排斥和矛盾的过程。”然而，他也承认：“尽管有时情况全球化的力量确实改变了本土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破坏了本土文化。”（Sklair, 2001, p. 256）

莎珊（Sassen, 2000）重申了这一点，并坚持在世界的文化和民族的文化之间存在着积极互动的因素和明显的重叠性。世界的文

* 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是指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国家，它是国家的一种，在理想的民族国家里所有公民使用同一语言，分享同一文化和道德价值观，而大多数历史形成的国家没有这一特征。——译者注



化存在于民族的文化之中,民族的文化也同样存在于世界的文化之中。她解释说:“宏观上来说,全球化进程通常根植于民族文化空间之内,且通常由国家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措施保证其实施。”(Sassen, 2000, p. 218)然而,她也承认存在着片面地诠释民族文化空间,认为世界文化异于民族文化这样一种新趋势。很明显国家可以制定法律并采取措施来引导经济自由化,但同时国家也不能完全不受全球化的大潮的影响。正如莎珊所称:“将民族国家看作是一个容器”,作为时间和空间中的一个固定实体的观念,是极其错误的(Sassen, 2000, p. 215)。世界的和民族的是相互杂糅的:“一国的中央银行是在该国经济中实施全球银行业的新规则(特别是普遍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的关键。这就意味着国家机构可以促使全球经济体系的一些运行规则在其本国实施。”(Sassen, 2001, p. 228)

因此,超国家组织(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²,在某些国家实施全球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一点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尤为明显,这些国家被迫卷入超国家组织的巨大网络中并被其左右。随后,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制定相关法律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或者结构调整的原则成为本国规则。正是通过民族国家,全球化实践逐步进入了经济领域。

很多这样的国家无法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援助。世界银行负责评估并决定这些国家如何才能适应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规则。通过自由贸易运动进行的全球经济整合,正如戴利所言很明显是非常好的(Daly, 1994)。他在给世界银行的告别演说中说到:“‘全球化主义者’这个词有着政治正确的含义,然而‘民族主义者’这个词已成为贬义词。”他宣称:“通过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自由地进行(或者至少是不受控制的)人员流动,逐渐消除国家之间的经济边界从而使经济全球化,会给那些致力于谋取人类共同利益的主要社会组织带来致命的打击。”(Daly, 1994, p. 116)

同样,阿帕杜莱(Appadurai)对这一问题也很关注,特别是关注全球化对世界最贫穷国家可能带来的影响。他将全球化过程描述